

张高臣 / 著

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

Guang xu chao zai huang yu she hui yan 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高臣 / 著

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

Guang xu chao zai huang yu she hui yan 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 / 张高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5161 - 4896 - 9

I. ①光… II. ①张… III. ①自然灾害—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②救灾—历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X432 - 09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7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郎丰君
责任编辑 郎丰君
责任校对 孙青青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特征做过这样一段精辟描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①然而，恰恰是这些让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引以为自豪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又孕育着巨大的破坏性潜能，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灾害种类最多、频次最高、破坏性极强的灾害之国。

气候上，我国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东部，又在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较近，冬夏高低气压中心的活动和变化显著，是世界上最大的季风气候区。由于季风带来的降水时空分布很不均衡，年际变化过大，降水量也不稳定，极易发生旱涝灾害：北方春旱比较突出，盛夏常有暴雨、洪水和内涝，雨季有时又长期少雨，出现夏旱；长江流域梅雨期也不稳定，有时梅雨期过长，降水量过大，出现洪涝，而有时又过短，发生夏旱连秋旱。此外，夏秋季节东南沿海时有台风活动，带来狂风、暴雨、巨浪，而冬季强寒潮侵袭，又时常带来严重霜冻。地质上，我国处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地震带——环太平洋构造带和欧亚构造带之间，地壳运动活跃，地震活动剧烈。地形上，我国陆地地势高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度相差悬殊，西高东低，自西向东逐渐下降，构成巨大的阶梯状斜面。各级阶梯地势都是东坡陡峻，西坡和缓，呈阶梯状上升。这种地形易使地表水宣泄不畅而发生洪涝灾害，同时也使天气、气候变化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正是这样的地质、地貌和气候特征，为自然灾害的频发准备了条件。邓云特先生（即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述及：“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可征者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近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①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的远古先人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英雄神话中所表达出来的对普天之下风调雨顺的向往，就一直成为千百年来其子子孙孙祈之祷之孜孜以求的永恒而又常新的共同目标。但是，这种目标永远也不能变成现实，因为中国独特的环境背景决定了自然灾害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生于斯息于斯的中国人不得不面临着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②

自然灾害是因自然力量的变化而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离开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无所谓灾害。自然灾害不属于直观上的社会活动，但它始终和人类社会相伴而行。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往往直接造成人口的死亡、流移和物质财富的毁坏，从而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危及社会安定、造成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因而，自然灾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学者没有理由对它熟视无睹。对此，经济学家朱其华在谈到近代中国灾荒问题时即指出：由于“灾荒已成为经常的普遍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已经不能把它视为偶然的特殊的现象而划出于议事日程之外，应该把它归列在经常的普遍的现象而与一般问题共同研究。”^③

然而，虽自两汉时期始，中国就有了系统的灾害文献记载，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页。

②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1页。

③ 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版，第5页。

一段时间里，灾荒史的研究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甚至没有得到起码的注意。这主要缘于：其一，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和军事事件的频发及社会性质的逐步转变必然要吸引学术研究的视线，左右学术研究的方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垄断学术研究的内容。其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①由于自然灾害的爆发是属于“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作用的结果，并无直接社会意义上的感情思维的色彩，这种特点往往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对自然灾害展开研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分内之事，它不属于社会历史科学的研究范畴。其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积极性。几方面因素的结合导致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大大滞后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而于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则尤其如此。

可是，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灾害与社会相联系的角度加强我国灾荒史的研究是那么的必要。这是因为：

1.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②由于社会历史是五彩缤纷、丰富复杂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多棱面的和包罗万象的时空范畴。因而，进行历史研究，既应注意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方面，也应注意到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只有从不同视角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分析、研究，才能逐步还原出真实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原貌来。而灾荒问题，恰恰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自然灾害不仅对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从灾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③ 李文海：《李文海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的灾荒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系统和准确的把握。

2. 就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1949年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表明中国人民已经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走上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但自然灾害却并不因此而稍许敛迹，停止肆虐，它依然残酷无情，祸患人间。诚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抗灾能力较之过去有了大幅度提高，老百姓也切实体会到了“一样灾害两重天”的内中含义。即便如此，自然灾害对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和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仍十分严重。据1995年由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20世纪50年代我国年均因灾死亡人数为9878人，60年代为6664人，80年代为7047人，90年代（1990—1994年）为7014人。^①就年均经济损失来说，折算成1990年价格，20世纪50年代约480亿元，60年代约570亿元，70年代约590亿元，80年代约690亿元，90年代前5年年均约1190亿元。^②1995年后，在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受灾区域人口和财富密集，灾害损失，尤其是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态势。1995年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863亿元，1996年为2882亿元，1997年为1944亿元，1998年为3007.4亿元，1999年为1962亿元，2000年为2045.3亿元，2003年为1886亿元，2004年为1600多亿元，2005年为2042.1亿元，2006年为2528.1亿元，2007年为2363亿元。2008年更是中国自然灾害大爆发的一年，殃及全国19个省区的特大冰冻灾害、四川汶川里氏8级特大地震、席卷南方12个省区的洪涝灾害等特大灾害频发，给中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据民政部消息，2008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死亡和失踪88928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3547.5亿元。2009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23.7亿元。2010年是近20年来仅次于2008年的第二个重灾年份，当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导致直接经济损失5339.9亿元，因灾死亡失踪7844人。2011年直接经济损失

① 《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② 同上书，第403—407页。

3096.4 亿元, 2012 年为 4100 多亿元, 2013 年则达到 5808.4 亿元。

上面用较多的文字列举新中国成立以后, 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因灾损失情况, 旨在说明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代中国, 自然灾害仍对生息于此的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威胁, 对中国社会和谐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而如何有效地防灾、抗灾、救灾, 依然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和严峻挑战。毛泽东曾经说过: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① 加强灾荒史的研究, 可以从对中国历史灾荒的总体了解中, 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因而, 加强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是深化历史研究的要求和现实社会防灾救灾工程建设需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人口、资源、环境、灾害和社会发展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如何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我国以李文海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历史学者敏锐抓住了这一研究契机, 他们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 并逐步带动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批学者对于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兴趣。几乎与此同时, 面对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 为唤起人们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 敦促各国把减轻自然灾害列入工作计划, 推动各国采取措施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 1987 年 12 月, 第 42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69 号决议, 将从 1990 年开始的 20 世纪最后 10 年定为国际减灾 10 年。1989 年 12 月, 第 44 届联大又通过决议, 指定每年 10 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为国际减灾日。国际减灾 10 年活动结束后, 联大又通过决议, 决定继续开展国际减灾日活动。响应联合国的倡议, 中国政府为改变“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灾害损失严重、而防灾意识又比较薄弱的大国”^② 之现状, 于 1989 年 4 月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 大力倡导防灾救灾研究。学者的带头, 国际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534 页。

^② 《人民日报》1988 年 2 月 13 日。

会的倡议,中国政府的重视,再加上耳闻目见的严重灾害,使国内史学界越来越关注和重视起了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并逐步兴起了一个灾荒史研究的热潮。经过多年的努力,有关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出现了一批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一支虽然数量不多,但结构合理、思想活跃的专业队伍。^①当然,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门类比较起来,目前对于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仍显单薄,即使灾荒史内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研究都不能说是充分,至于整体研究就更显得薄弱了。但客观地说,这毕竟是已经付出巨大的努力了。

就中国灾荒史的研究而言,李文海先生指出,“清代灾荒问题应该是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首先,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研究清代的灾荒,对今天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清代灾荒极其严重,而人民群众的抗灾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的救荒机制及实际运作,也集古代荒政之大成,更加完备和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最后,迄今留下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也以清代为最多。”^②

本书之所以选取光绪朝的灾荒作为研究对象,除上述因素外,还出于以下考虑:

光绪朝是清代十朝中的第九朝,撇开时间短暂的宣统朝不谈,光绪朝是清代距离我们最近、统治时间较长,且社会变动剧烈的一个时期。从环境变迁和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的角度来衡量,选择“光绪朝”这样一个历史时段的灾荒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显得过于狭隘,然而正是这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瞬间,包含了太多的重要历史内容,它显现出了过去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里才会显现的纷繁、复杂、变幻和动荡。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英、俄对西藏的入侵,80年代的中法战争,90年代

① 李文海:《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 同上。

的中日战争，世纪之交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些内容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和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都是引起剧烈的社会震动，影响到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34年时间里发生的这么多重大历史事件，历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

或许并不只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与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表象同步，在光绪朝34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史所少见的重大灾害。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夏禹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两汉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明清灾害群发期（公元1500—1800年）、清末灾害群发期四个灾害群发期。^①关于“清末灾害群发期”的起迄时间，人们的看法尚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将清末灾害群发期定在1870—1911年间，有的主张是1840—1890年，也有的主张是1820—1880年，或是清末民初，有的则径直将其下限延续至今，称之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灾害群发期”。^②综合大量事实及各家意见，可以认为，清末灾害群发期的高潮大约在1840—1890年间及其附近年代。光绪朝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时间正处于这一灾害群发期中。综观光绪朝的自然灾害状况，可以说是绵绵不绝，危害无穷，举其大者如：1877—1878年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1879年甘肃里氏8级大地震、1882—1890年黄河连续9年漫决、1889年的全国性大水灾、19世纪末叶连年发生的顺直水灾、戊戌维新时期以潦为主的全国灾荒、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旱为主的全国灾荒等等，无不在中国灾荒史上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一页。如果说一部二十四史，几无异于一部中国灾荒史的话，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4年的光绪朝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频繁、极为严重的一段灾荒史。

关于光绪朝的灾荒问题，《清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

① 参见高建国《灾害学概论》（续），《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严重自然灾害群发期与社会发展》，载马宗晋：《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任振球：《全球变化——地球四大圈异常变化及其天文原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46页。

稿》、《光绪大清会典》、《光绪政要》等典籍以及《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杂志，都有较多的载录，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馆藏的《军机处录副档》中更存有大量的灾荒档案资料，所有这些，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灾荒提供了诸多便利。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中国人民在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之下挣扎搏斗的种种悲壮情景，明了中华民族曾经遭受过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巨大灾难；利用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具体地探索出光绪时期灾害发生的成因、规律，弄清政府和民间面对大自然的淫威所作出的反应及效果，了解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光绪朝灾荒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为我们透视光绪时期自然灾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窗口，同时也为我们探究中国当今的灾害和预测未来的灾害，从而更有效地进行防灾救灾提供历史借鉴。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①寥寥数语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对光绪朝灾荒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正是为了赋予尘封的“过去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

当然，由于知识水平上的欠缺，同时由于研究数据的缺乏，书中有些问题的分析还不够到位，这也是笔者在以后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的。本书著述过程中错漏难免，恳请同行们批评指正。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节 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的学术回顾 / 2	
一 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 2	
二 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 / 4	
三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书的目标 / 13	
第二节 研究方法、基本框架和创新点 / 15	
一 研究方法 / 15	
二 基本框架 / 17	
三 创新点 / 18	
第一章 光绪朝 (1875—1908) 灾况概览	21
第一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种类和频次 / 21	
一 自然灾害种类多 / 22	
二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 / 22	
第二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 / 33	
第三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的破坏强度 / 38	
第二章 光绪朝荒政的制度运作及发展困境	57
第一节 清代“荒政”简介 / 57	
一 备荒 / 58	

二 救荒和恢复生产 / 65

第二节 光绪朝荒政举措及其社会影响 / 73

一 光绪朝荒政举措及效果 / 74

二 光绪朝荒政的制度性缺陷 / 83

第三节 光绪朝荒政失控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 105

一 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日渐衰微 / 105

二 国家财政匮乏 / 113

三 吏治严重腐败 / 127

第三章 光绪朝救荒机制的近代转型 139

第一节 近代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 139

一 义赈的缘起 / 139

二 近代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 141

第二节 近代义赈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 147

一 官赈不力客观上为近代义赈的兴起让出了活动空间 / 147

二 传统慈善机构慈善活动的传承 / 148

三 近代东南地缘共同体的形成——近代义赈兴起的支点 / 151

四 西方传教士对华赈灾活动的影响和刺激 / 155

五 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参与 / 161

六 近代传播媒介的出现 / 165

第三节 近代义赈对传统民间赈济的超越 / 167

一 募捐和赈济范围的差异性 / 168

二 技术手段的差异性 / 169

三 赈灾地位的差异性 / 170

四 赈灾性质的差异性 / 171

五 组织形式的差异性 / 171

六 工作程序的差异性 / 171

七 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 172

八 救济理念的差异性 / 172

第四节	近代义赈对传统救荒机制的制度性冲击 / 173	
一	近代义赈的社会效果 / 174	
二	近代义赈对传统救荒机制的冲击 / 176	
三	近代义赈的经验启示和局限性 / 186	
第四章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	189
第一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 / 189	
一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人口的增减 / 193	
二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流民潮 / 197	
三	光绪朝自然灾害对人口结构和灾民素质的影响 / 210	
第二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 / 226	
一	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愈显拮据 / 226	
二	光绪朝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 / 230	
三	光绪朝自然灾害对商业贸易的影响 / 251	
第三节	光绪朝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 / 259	
一	光绪朝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概况 / 260	
二	光绪朝因灾引发的社会冲突类型 / 267	
第五章	光绪朝各政治派别灾荒观探析	277
第一节	“天象示警”的传统灾异观的延续 / 277	
第二节	清流派“重本”、“恤民”的灾荒观 / 282	
一	清流派关于灾因的认识 / 282	
二	清流派关于防灾救荒的务实性建议 / 285	
第三节	洋务派“师夷”特色浓厚的灾荒观 / 289	
一	洋务思想家对传统灾异观的批判 / 290	
二	洋务派对于中国灾荒成因的认识 / 291	
三	洋务派关于防灾救荒的荒政主张 / 297	
第四节	戊戌维新派“维新”特征突出的灾荒观 / 303	
一	维新派关于中国灾荒成因的揭示 / 303	

二 戊戌维新派对于解决中国灾荒问题的思考 / 309

第五节 “标本兼治”——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灾荒观 / 315

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近代中国灾因问题的深入思考 / 315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祛灾除荒的远见卓识 / 321

三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灾荒观的简单评析 / 327

主要参考文献 331

后记 345

绪 论

现代学者夏明方先生在其专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中指出：“‘灾’与‘荒’原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灾’即灾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可抗的自然力对人类生存环境、物质财富乃至生命活动的直接的破坏和戕害，而‘荒’即饥荒，则是天灾人祸之后因物质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短缺所造成的疾疫流行、人口死亡逃亡、生产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宁等社会现象。‘灾’是形成‘荒’的直接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荒’是灾情发展的结果，但不是必然的结果。由‘灾’而‘荒’，通常的情况下是要通过灾害学中所说的‘社会脆弱性’这个中介才能完成的。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在灾害形成过程中，人的因素不能排除，但人毕竟是通过自然力来实现其破坏性能量的，而在荒的形成过程中，则是自然力通过人的活动而不断扩散和放大的。由于旧中国几乎每‘灾’必‘荒’，故而在时人的著述中，灾害与灾荒即是同义词。”^①应该说，这段论述较为准确地阐明了灾害与灾荒的关系。本书之所以以《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为题，意在强调由于光绪朝的“社会脆弱性”，加大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社会脆弱性”，使自然灾害发生后的破坏力不断扩散、放大，影响到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之中。

^①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页。

第一节 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研究的学术回顾

学术研究是一个前后承续、不断发展的过程。要真正做到对光绪朝灾荒与社会的系统深入研究,则必须尽可能梳理清楚前人与之有关的既有研究成果,这既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也是展开本论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一 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

在中国,近代意义的灾荒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可敬的学术拓荒者在这一领域披荆斩棘,艰难地开辟着道路。自此至今,灾荒史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与总体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同步,学界对光绪朝灾荒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的三个阶段。

20世纪20—40年代为起步阶段。最早对灾荒史研究作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当属竺藕舫(即竺可桢),他不仅是运用现代科学解释灾荒史的先行者之一,而且是1949年以前发表灾荒史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①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发表的70多篇文章中,有多篇是研究自然灾害的,如《气象与农业之关系》(《科学》,第7卷第7期,1922);《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2卷第3期,1925);《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清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史学与地学》第3期,1928)等。其中《清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是这一时期直接论述清代灾荒最早的文章。此外,李仪祉在其《北方五省旱灾之因暨其根本救治之法》(《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8)一文中,从气候、地理和人事三个方面的关系中探讨了“何以北方偏多旱灾”。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1931年江淮大洪水的暴发,更多的学者开始涉足灾荒史的研究,并发表了数量和质量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中国灾荒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出现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① 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